

# 企业本质：技术、权威、合约

## ——以对企业家团队内部联接的理论分析为例

许光伟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问题导向的一致性决定马克思企业理论与西方主流企业理论之间总体具有异同性质。这种理论异同性质从“科斯难题”的破题入手,旨在申明:企业家团队的内部联结本质是企业本质的进一步发展;狭义视阈的技术和权威的企业分析框架应被进一步推进到广义视阈的技术、权威、合约的企业分析框架。立足于“联结本质”的历史演进的演绎和分析,从而确实可以增进企业本质的认识逻辑链条。

**关键词:**技术;权威;合约;联结;企业本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07)01-0105-06

自1970年代企业理论成为理论文献最富爆炸性增长的领域之一以来,经济学各流派都试图就其基本问题发表各自的理论观点。现今的“两大经济学体系”也概莫能外。由此形成两大企业理论体系的对峙——马克思企业理论与西方主流企业理论。一方面,哲学世界观的不同,决定两者所使用的理论工具、所表述的基本经济范畴以及直接的研究结果具有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问题和对象的相同,又决定不同的理论以及方法之间没有理由完全相异,必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历史维度的引入以及真正知识主义进路的研究视角的创设,则使得两者就总体而言具异同性质。因而简单地说,两大企业理论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别,毋宁被说成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这就意味着两者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包含与被包含、扬弃与被扬弃的关系。

### 一、企业的联结本质

马克思以技术和权威看待企业本质。在《资本论》中,他这样写到:“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以及“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sup>[1](P384-386,415-416,427)</sup>等等。即囿于既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马克思总体以劳动价值论的产业视角看待和审视资本主义生产,企业被直接看作为基于分工协作的一种团队生产组织,并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社会目的。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要点包括:(1)在技术既定的条件下,“权威因素”是决定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决定性条件;(2)在权威既定的条件下,“技术关系”是限制资本主义企业规模扩大的决定性因素;(3)生产力的历史变迁最终决定着技术与权威的结合关系的变迁,在此基础上,则导出一个企业组织形态变迁的理论框架。对于前者,马克思在分析“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一节强调:“人数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对于中者,马克思接着讲到:“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以及“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

收稿日期:2006-11-19

作者简介:许光伟(1971-),男,安徽滁州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

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列加以表达: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观点看待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将之归结为“劳动迂回中心”的性质<sup>[2]</sup>,提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的具体观点<sup>[1]P210</sup>,认为分工本身不过是由生产力所引起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分工就是技术与权威耦合关系的直接表现——“生产的基本形式”<sup>[3](P640)</sup>或“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sup>[4](P68)</sup>,并且归根结底,技术和分工总会表现为相应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变迁。

与此对应的是,科斯以权威和合约看待企业本质。科斯同斯密一样,也是一位二重性思想者。科斯的二重性思想体现在“科斯难题”之中。在科斯的1937年的经典文章中,“科斯难题”可以通过这样的理论诘问来精练:“为什么通过权威关系企业就能减少交易费用”以及“交易费用的减少果真是通过减少合约数量来达到的吗”<sup>[5]</sup>。从“科斯难题”出发,科斯以二重性的“权威-合约理论”<sup>①</sup>奠基了他的企业理论。因此,“科斯难题”在实质上也是一个关于权威与合约的“二律背反”命题。

具体而言,科斯本人对“科斯难题”的解题是:(1)提出“企业家说”;(2)提出“科斯猜想”;(3)提出合约与权威的“相互限制说”。对于前者,科斯认为企业家是能够将“权威与合约”有机融合的特殊生产要素,因为“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市场交易来协调的”,而“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所以科斯将“企业家”界定为:“在一个竞争性体制中替代价格机制的人或人们”。对于中者,科斯接着讲到:“某些人有更好的判断或知识,并不意味着他们通过亲自参与生产活动才能从这种判断或知识中获得一份收入,因为他们可以出售这些建议或知识,每个企业都向大量的咨询机构购买建议,即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体制——所有的建议或知识都是按需购买的。”这就是所谓的“科斯猜想”。“科斯猜想”说明科斯欲以“科斯特企业家”替代“奈特式企业家”的概念,更为强调“管理知识”在企业内涵中的重要性。对于后者,科斯除了强调在企业内由于“企业家指挥生产”而使得“一系列的合约被一个合约所替代”之外,还强调“通过合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

的报酬(可以是固定或浮动的)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而合约的本质仅在于它限制了企业家的权力范围,即只有在限定的范围之内,企业家才能指挥其他生产要素”<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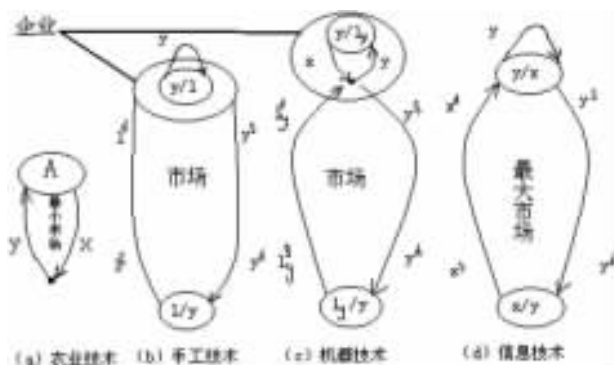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企业故事”

比较分析两个企业理论体系的异同性质,第一,如图1<sup>②</sup>所示<sup>[7](P153)</sup>,马克思由于侧重研究企业生成的长时态和历时态,因而侧重研究决定企业生成的技术层面(图(b)和(c)),并在分析上将“权威因素”与“技术条件”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两种分工理论”;另一方面,企业的合约性质在这里是“存而不论”的,即沿用马克思的“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用语”的说法,合约不过是分工的法律用语,所以马克思认为合约作为分工的法律对应物,其作为企业内部分工的社会表现形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换言之,企业必然会采用完全合约(市场合约)作为外部的表现形式,而采用不完全合约(劳动合约)作为内部本身的表现形式。第二,与马克思截然相反的是,西方主流企业理论侧重研究企业生成的短时态和共时态,“科斯难题”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抽掉了“资本家的为何生成”(图(b)),而仅仅试图考察“企业家的如何生成”(图(c)),从而如同马克思所批判的“先假定一方存在资本家,另一方存在工人,然后好通过双方的协议建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sup>[8]P13</sup>,因此是失掉了历史前提的“纯粹逻辑”。进一步,西方主流企业理论相应也极力地抹杀“两种分工”之间的质的界限,抹杀“古典的企业起源的分工说”<sup>[9]</sup>,目的则是根本否认合约背后的经济实质,否认劳动分工对合约性质的直接决定作用。第三,就同一的对象而言,无论马克思企业理论还是西方主流企业理论都似乎存在“片面性”,前者侧重了“资本批判逻辑”,后者侧重了“资本至上逻辑”,

由此,两者的对接只有在“技术-权威-合约”的框架之内通过将企业的特殊本质上升为一般本质,才能够真正地完成。

为了能够对两个企业理论体系进行真正的综合叙述,图1作了必须的技术性处理:(1)抽象出四种纯粹的“技术形态”作为共时分析的基础,并以“农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作为必要的历史约束条件和叙述参照系,由此为企业的逻辑演化提供了历史依据;(2)区分“资本家”和“企业家”,界定后者既是在历史中累积演化的产物,也是由前者逐步演化和历史直接跃升的产物,进而区分两类不同意义的企业家,即第一类意义的企业家—不具有管理知识的资本家(图(b))和第二类意义的企业家—具有管理知识的资本家(图(c));(3)马克思采用的是“劳资关系的资本家向度”,所以叙述范围包括两类意义的“企业家”的全部,而科斯采用的仅仅是“劳资关系的企业家向度”,所以在叙述范围上仅包括第二类意义的企业家。

综上所述,图1可以提供以下几点进一步的理论涵义:

首先,马克思和科斯的共通之处是都承认在企业组织生产的方式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组织生产方式,即都承认企业本身有其存在的原因和依据。但后者由于仅仅看到企业家对管理知识的依存性,而倾向于把企业家的权力来源赋予管理知识市场(图(d)),即本质上是“外部权力说”;前者则由于持有唯物史观,而倾向于把“资本家”单独抽象出来处理,并把资本家的权力来源赋予包括商人资本的历史起源、包买商生产以及封建生产方式变革等等因素在内的社会生产力的演进,即本质上是“内部权力说”。

其次,“劳动管理型企业”(LMF)所以相对于“资本管理型企业”(KMF)罕见,并不意味着LMF无法存在或无效率<sup>[10]</sup>,而意味着LMF——实质内容是“劳动雇佣资本”——不是一种纯粹的企业形态。Dow认为,如果正式的与最终的控制权在劳动者手中,就是LMF企业,KMF与LMF的区别就成了谁来掌握企业控制权的问题,但Dow的LMF定义也仍然回避、替代不了对“劳动雇佣资本”的规定<sup>[11]</sup>。所以应当可以明确的是,LMF仅仅是一种制度装置,是人力资本得以保存的制度装置,间接地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自我定价器,只不过就LMF本身而言,却

仍需以一定形式的“资本雇佣劳动”作为其社会存在的基础和依托。

再次,随着协作性质以及团队生产的演进,使得KMF与LMF的“历史内涵”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是“资本家的权威”将被逐步地稀释,另一方面是“企业家的权威”将被逐步地加强,由此使得“第三类意义的企业家”可以历史地出现。于是,资本主义企业在历史上可以被整体“分割”为三种基本的形式:其一,以非人力资本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企业(图(b));其二,以人力资本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企业(图(c));其三,以企业家团队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企业(图(b)、(c)的发展形式)。

最后,可以给出关于企业本质的相对完整的概括是:由企业本质的动态性和变迁性决定,企业本质因而基于本身而言是历史和多维的。从此意义上讲,无论马克思的“技术-权威”的分析框架,还是西方的“权威-合约”的分析框架,就其本身而言都还面临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的问题。由此,“技术-权威-合约”的分析框架,一方面作为企业理论基本分析构架的自身的发展而必然会与“企业本质”相联结,另一方面也必然会触及企业内部粘性生产要素的“联结本质”,进而直接促使企业家团队的内部的“联结的本质”与“技术-权威-合约”的分析框架一起,在其本身也就不过表现为“企业的本质”在历史中的进一步发展而已<sup>③</sup>。换言之,“联结本质”直接取得了企业本质的一般化的形式。

## 二、模型及评析

模型I:以非人力资本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企业

设立两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即市场生产方式和企业生产方式,由于资本家一般地追求“生产剩余最大化”<sup>④</sup>,采用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则可得:

$$\text{Max}IT^M = R^M - C_p^M - C_t^M$$

$$\text{Max}IT^F = R^F - C_p^F - C_t^F$$

其中, $R^M$ 、 $R^F$ 分别代表市场组织生产的收益、企业组织生产的收益, $C_p^M$ 、 $C_t^M$ 代表市场的生产费用、交易费用, $C_p^F$ 、 $C_t^F$ 代表企业的生产直接耗费、生产交换耗费;说明该模型中,企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非熟练工人”协作基础上的团队生产方式,从而, $C_p^F$ 即代

表“生产作业工人的劳动部门”的资本耗费,  $C_t^F$  即代表“生产交换工人的劳动部门”的资本耗费<sup>⑤</sup>。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模型相对简化,即可以合并“市场生产费用、市场交易费用”为广义市场交易费用——而所谓的“广义市场交易费用”不过是交易技术的简单函数,相应地合并“生产直接耗费、生产交换耗费”为企业生产耗费——同样所谓的“企业生产耗费”也不过是生产技术的简单函数,同时,令“收益”一般地为生产产出——这里仅表现为劳动产品或劳务——的简单函数,即可以得到:

$$\text{Max}IT^M = R^M(Q^M) - C^M(f^M)$$

$$\text{Max}IT^F = R^F(Q^F) - C^F(f^M)$$

小结:(1)“资本家”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说明“资本家企业”如何原生的问题,是由模型之外的因素——显然是“历史生产力”的因素所决定的;(2)如果  $f^M < f^F$ , 根据马克思界定的“商品价值量(成本价格加成)与劳动生产力(技术)成反比”的法则,一般地,  $C^M(f^M) > C^F(f^F)$ , 则在具有相同的生产产出的情况下,存在  $IT^F > IT^M$ , 说明技术是限制资本主义企业规模扩大(企业再生)的决定性因素;(3)企业生成是“原生”与“再生”的统一,其中,企业原生对企业再生具有决定和制约性质——在“量”上则具有调控和放大作用,而这个机制最终是通过技术进步的本身来传导的。

模型 II:以人力资本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企业

“人力资本”引入资本家企业,使得资本家的“生产函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sup>⑥</sup>:

$$\text{Max}IT^M = R^M - C_p^M - C_t^M = R^M(Q^M) - C^M(f^M)$$

$$\text{Max}IT^F = R^F - C_p^F - C_t^F - C_s^F - C_m^F = R^F(Q^F, u) - C^M(f^F, h)$$

其中,  $C_t^F$ 、 $C_m^F$  代表企业的技术耗费、管理耗费,  $u$ 、 $h$  分别代表“差别竞争能力系数”和“人力资本才能系数”;由于人力资本进入生产函数,使发生的“深刻变化”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人力资本才能进入成本函数,表现为“技术和管理劳动部门”的资本耗费;第二,差别竞争能力进入收益函数,表现为企业所获得的额外的“差别利润”,说明该模型中的企业生产方式是直接建立在“熟练工人”协作基础上的团队生产方式,意味着“熟练工人”获得了区别于“非熟练工人”的差别的存在,即或者说是“人力资本的存在”。

进一步地可以将以上模型变形为:

$$\text{Max}IT^M = R^M - (Q^M)(f^M)$$

$$\text{Max}IT^F = [R^F(Q^F) - C^F(f^F)] + [\Delta R^F(u) - \Delta C^F(h)]$$

变形后的模型说明:真正的“差别利润”取决于人力资本工人的投入产出比。

小结:(1)“资本家”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而“人力资本”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说明“第一类意义的企业家”已然跃升为“第二类意义的企业家”;(2)如果  $f^M < f^F$ , 且  $\Delta R^F(u) > \Delta C^F(h)$ , 则此时资本家会选择企业而不选择市场;(3)进一步地看,资本家是否会最终选择企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他的管理知识能否“粘住”他的人力资本工人。

模型 III:以企业家团队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企业

在模型 I 中,资本家被设定为“工人的统一意志”,在模型 II 中,资本家则被设定为一种“有粘性的统一意志”,由此,“资本家”与“企业家”之间的“绝对的差别”转变为了“相对的差别”,但同时我们又会在模型 III 中看到了这种形式上的“逆转”<sup>⑦</sup>:

$$\text{Max}IT^M = R^M - C_p^M - C_t^M = R^M(Q^M) - C^M(f^M)$$

$$\text{Max}IT^F = R^F - C_p^F - C_t^F - C_s^F - C_m^F = R^F(Q^F, \theta) - C^M(f^F, e)$$

其中,  $C_t^F$ 、 $C_m^F$  的含义基本同模型 II, 但具体而言,前者代表“技术和研发耗费”,即“技术研发人员的劳动部门”的资本耗费,后者代表“经营管理耗费”,即“经营管理者的劳动部门”的资本耗费;而  $\theta$ 、 $e$  则分别代表“创利能力系数”和“企业家才能系数”;这说明以“资本家”的单独存在为条件,这时的“企业家”也有了脱离其母体的相对单独存在的形式——企业家团队的形式,从而使得“逆转形式”的意义为:第三类意义的企业家的存在又是以剥离其母体的“管理知识”作为前提条件的<sup>⑧</sup>。

同样,也可以将以上模型继续加以变形:

$$\text{Max}IT^M = R^M(Q^M) - C^M(f^M)$$

$$\text{Max}IT^F = [R^F(Q^F) - C^F(f^F)] + [\Delta R^F(\theta) - \Delta C^M(e)]$$

变形后的模型则说明:真正的“企业家”取决于创业者、经营管理者和技术研发者三方的通力协作。

小结:(1)“资本家”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而“企业家(团队)”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这说明也不应把“企业家企业”看作是独立形态,而应把它看作是历史地置入在“资本家企业”中的成长形态;(2)如

果  $f^M < f^F$ , 且  $\Delta R^F(\theta) > \Delta C^F(e)$ , 则此时“资本家”——出资者团队的代表者——会通过选择企业家（团队）而选择进入企业, 相反不会选择直接进入市场; (3) 所以归根结底地看, “资本家”是否会最终选择企业的生产方式根本地取决于“企业家团队”的性质和状况, 又根本地取决于创业者的企业家知识能否“粘住”经营管理者以及技术研发者。

### 三、简短小结

从组织粘性能够进入生产函数入手, 聂辉华试图重新解释科斯的企业契约本质的二重性命题, 因此将“企业理解为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sup>[7]</sup>。但一方面囿于技术基础的限制, “权威关系”还不能完全地配置给企业家; 另一方面申明“权威关系”能够通过组织粘性或企业家团队的联结减少交易费用, 也只是问题的结果而不是问题本身, 即“粘性组织或企业家团队为什么会存在”同样值得继续地“理论追问”。因此, 单就粘性组织本身的讨论, 也并不能为“科斯难题”破题, 上述推论充其量只部分地适用于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知识型企业。由此, 应该锁定以技术、权威和合约的完整视角来看待企业本质, 以企业家团队的内部的联结本质(作为真正视角的知识主义研究进路)寻求“科斯难题”破题的真正钥匙, 并以马克思企业理论观的历史特性研究确实推进企业本质的认识逻辑。

所以, 本文的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即应包括这么几点: (1) “劳资关系的资本家向度”和“劳资关系的企业家向度”不是根本相背离的, 而是可以相融合的。因为第一, 历史逻辑的“资本批判”不应当成为形式逻辑的“资本至上”的绝对束缚, 而应当基于现实而融和为“资本的辩证逻辑”; 第二, “资本的历史逻辑”与“资本的形式逻辑”的融合也正是资本分析视角的长时态、历时态与短时态、共时态, 以及资本权力视角的“内部权力说”与“外部权力说”的有机结合。(2) 就本质而言, 人力资本不是一种独立的资本形态, 而只是形成中的对物质资本施加的一种约束和限制。(3) 第三类意义的企业家(企业家团队)的建设是现代企业家成长的基础和支撑点, 也是企业家与资本家博弈形成剩余均衡分配的中坚力量, 今后应加强对有关法律支持方面的研究, 创设企业家成长的法律框架和法律空间。(4) 诚如“合约是分工的法律用语”的断言, 应加强对分工是合约的法

律的实现形态的理论研究。展望企业理论的未来, 这也是能够打通和拓宽两大企业理论体系之间“理论瓶颈”的最为现实性的理论步骤, 甚至是最为可行性的理论尝试。

注 释:

- ① 它的准确涵义是“以权威为基础的合约理论”, 而不是如西方学界所宣扬的, 是“纯粹的合约理论”、“纯粹的权威(合约)理论”或者两者的杂合。
- ② 该图是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故事”的一个精炼, 图中的字母涵义均同原图, 其中图(b)中的“l”在内涵上为“l(lx, ly)”, 即代表马克思所说的“总体劳动”。
- ③ 显然, 这个结论与 Rajan&Zingales 对于企业进行功能主义的解释——将企业视为共同所有的关键性资源、才能、思想以及拥有此类资源的通道的人的集合——相比, 更加突出了企业本质的历史内涵。
- ④ 这样假设纯粹是为了方便起见, 因为从广义生产看, 剩余价值概念完全可以一般化。
- ⑤ 经济学家对于人力资本的界定, 偏重于“投资机制”而忽略“保存机制”, 即相对忽略了人力资本的组织内涵、社会内涵以及文化内涵。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以直接使用“复杂劳动”(熟练工人劳动)而不使用“人力资本”概念即在于避免定义的复杂性。而严格地说, 马克思的“复杂劳动”概念既可对应于人力资本又可对应于非人力资本。在这里, 马克思则严格限定于“简单劳动”(非熟练工人劳动)进行叙述, 因为马克思认为, 假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平均的社会劳动, 可以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 同时, 关于交换劳动, 马克思具有二重的观点: 一方面认为“交换劳动不创造价值”, 是间接领取工资的劳动, 另一方面则强调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 还必须有相应的“价值追加”(参见《资本论》第二卷第六章), 可见,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是深受其产业分析视角的约束的。
- ⑥ 人力资本对资本家企业的导入依据于“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的历史事实。
- ⑦ 关于这种形式逆转, 马克思也有经典的叙述, 即“在简单协作中, 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 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 变成局部工人, 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 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参见《资本论》第一卷, 中文2版, 第418页), 但马克思只是以“劳资关系的资本家向度”来把握和阐释这种经济现象的。
- ⑧ 值得注意的是, 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资本革命”的端倪, 他指出, 随着信用和股份公司的发展, “工业制度的灵魂已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 所以支薪经理“在其他场合是偶然发生的, 而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

总而言之,“资本家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中文2版,第434-436页)。

参考文献:

- [1]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 许光伟. 再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企业的生产力累积论[J]. 经济评论,2006,(3).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 1937, Vol.4, No.3, 386-405.
- [6] 聂辉华. 企业: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J]. 经济研究,2003,(8).
- [7] 杨小凯.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9] 黄桂田,李正全. 企业与市场:相关关系及其性质—一个基于回归古典的解析框架[J]. 经济研究,2002,(1).
- [10] 杨瑞龙,卢周来. 对劳动管理型企业的经济学研究:一个方法论的述评[J]. 中国社会科学,2005,(2).
- [11] Gregory K. Dow. *Governing the Firm: Workers' Control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责任编辑:许桃芳)

## The Nature of the Enterprise: Technology, Authority and Contract

XU Guang-wei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istency in settling common issues determines the character of co-existence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ist enterprise theory and the Western mainstream firm theories. This theoretical character can explain “Coase puzzle” by demonstrating that the nature of the adherence within the team of entrepreneurs is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e of the firm, an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from that of technology and authority in a narrow sense should be advanced to that of technology, authority and contract in a broad sense. An approach to the nature of adhere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gnizing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 and grasping its logical chains.

**Key words:** technology; authority; contract; adherence; nature of the firm